

周绍良先生的学术活动

白化文



周绍良先生，安徽至德县（今为东至县）人。1917年生。

周先生出身于一个学术世家。他的先代周馥，在清末以从宦之暇，编撰出《治水述要》一书，为近代整顿黄河的一部重要参考书。还有伯祖周学海老先生，为清末名进士，精医学，编撰有《周氏医学丛书》，是中医学最大的丛书之一。祖父周学熙先生，北洋政府时期曾任财政总长，编印过《师古堂丛书》。父亲周叔迦居士，是著名佛教学者，曾任教于清华、北大、民国、中国、中法诸大学，著有《中国佛教史》、《八宗概论》、《因明新例》、《新唯识论》诸书，著述极为丰富。周先生的几位伯父都是著名学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周叔弢老先生，为海内名藏书家。其收藏与当时的李盛铎氏木犀轩、傅增湘氏藏园齐名，解放后全部捐赠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处。另一伯父周季木先生是金石学家，又一伯父周明泰（志辅）先生是戏曲学家和历史学家。

周绍良先生就出身于这样一个学术气氛极为浓厚的大家族中。这个大家族极注意家庭教育，子弟们大半先在家塾读书，然后才转到中学、大学去。家塾师资极一时之选。如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通伯）老先生，还有吴其昌、唐兰诸先生，都曾先后在

他家任馆师。周先生的业师，早期主要是谢国桢（刚主）先生。谢先生除了教导周先生读一般过去家塾应读之书外，重要的是教授点读《资治通鉴》。点读时并要求作一些考订工作。周先生重点以《唐纪》部分和两《唐书》对读，写出近千条笔记。这成为他后来治唐史和唐代文学的早期基础。

随后，周先生又拜陈垣（援庵）先生为师。陈先生也是主张点读的，并主张通读全史。陈先生的方法是以赵翼《廿二史札记》为纲目、为对象，在读史籍时全部复核赵氏引用的材料，校订赵氏的疏漏。这种严格训练，对周先生一生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陈先生正在校订五代史。周先生利用从学之便，从明刊本《册府元龟》中将全部唐代史实抄录排比，后来整理成《〈册府元龟〉唐史资料汇编》。

1936年，周先生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就读，主要从学于一些知名学者，如从孟森（心史）先生学《明清史》，从钱穆（宾四）先生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并特别注重对其中讲到的清代朴学进行研究。这对他后来研究唐史与文学史很有帮助。

抗战时期，周先生于1938年冬到云南，转徙于西南天地间。这段时期内，开始了对文学史的研究。

解放后，周先生供职人民文学出版社。

周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在这方面当然先要提到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这是周先生治学的重点之一。周先生对敦煌学的兴趣从三十年代初便已开始。当时，刘复（半农）先生与他的父辈是非常熟悉的，刘氏的《敦煌掇琐》正在出版。周叔迦老先生这时又在北京图书馆辨识《敦煌劫余录》中不知名经卷，与王重民等先生也属同事。两代学者的交流，刺激和促进了周先生研究敦煌学的兴趣，促使他着手收集、抄录一些敦煌发现的文学作品，这便是周先生研究敦煌俗文学的开始。

《敦煌变文汇录》是周先生所编的世界上第一部变文类（敦煌俗文学中说唱故事类）材料总集。1954年编入《中国文艺研究丛书》出版。其中汇集校点说唱佛经故事的唱经文、缘起、押座文等24篇，说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材料12篇，共36篇。对每篇材料均有简要说明、考订。在该书的《叙》中，周先生根据自己当时的研究心得，对这批材料的起源、体制等提出许多新的见解。末附《敦煌所出变文现存目录》。1955年出的增订本，增收材料两篇，增补了其它各篇的一些阙文，增订了《现存目录》。本书是这方面的开山著作。三年后，1957年，《敦煌变文集》出版，从其編集动机、目的方面观察，很明显地看出是受周先生这本书的启发与影响。

周先生撰写过一些有关敦煌俗文学的论文，重要者有以下诸篇：

《谈唐代民间文学》，此文最早发表于《新建设》1963年第一期，后迭经转载。它的副标题是《读〈中国文学史〉中“变文”节书后》，有其针对性，但论述的却是敦煌俗文学中说唱故事类材料的分类问题，远超乎一般“书后”范围。此文对历来被笼统称为“变文”的东西作了新的审查，加以区分。这是第一篇对这方面材料提出科学的、明确的、细致的分类的文章，可以说，它奠定了敦煌俗文学文体分类学的基础，对后来研究文学史和敦煌俗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校证》一文，则是周先生在校勘、注释敦煌俗文学作品方面的代表性力作，结合历史资料说明这节讲经文的内涵与背景，显示出雄深的学力。

周先生研究敦煌学，由于各方面的便利，得占有第一手材料。《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和《补敦煌曲子词》就是他提供的新材料。《悉达太子修道因缘》的完整写本藏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系日人于本世纪初自敦煌劫去者，经周先生校订后全文发

表。在文后的《跋》中并初次指出讲经与说法之不同，“讲经文”与“说因缘”之区别，是周先生对敦煌俗文学文体分类学研究的新成果。《补敦煌曲子词》一文，初次发表了周先生校订的十三首词，是曲子词研究三十年来发表的最新最多最重要的一批辑佚新收获。

《唐代变文及其他》一文，系应《文史知识》编辑部之请而作，载于该刊1985年12期和1986年1期。这篇文章是周先生总结自己对于敦煌卷子中说唱故事类作品四十年研究的成果，深入浅出，其中有许多创见，发表后深受敦煌研究者注意。

1987年6月，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在香港召开，周先生应邀参加，宣读了《敦煌文学概论》一文，约三万余字。其中对敦煌文学作品的分类归属等问题，提出了极为精确的见解，对敦煌文学各个部分的内容，也都进行了探讨，其涉及面之深广，令人叹服。此文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巨大兴趣，美国东方学学者梅维恒正在将其译成英文，准备在美国发表。

1982年，周先生搜辑汇编的《敦煌变文论文录》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共收自敦煌学创立以来至1979年底发表的有关论文五十七篇，分为二册，上册是带考释性的论文、下册是对单篇作品的专题研究。入选的文章内容广泛，基本上反映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书末附苏联所藏说唱佛经故事类作品五种，系国内首次校点发表。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这部论文集也是周先生领导纂集的，内收1986年在酒泉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第二次年会上提交的论文二十余篇，周先生亲自为之作序。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收集敦煌语言和文学论文的专集，它的出版，必将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周先生亲自领导纂集的《敦煌古文献》丛刊中的佛经和敦煌文学文献部分的編集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

其次，在古典小说研究的领域中，周先生也有突出的贡献。经常被人提到的有三篇文章。一篇是《读唐代的三国故事》，此文运用唐代僧人释大觉的《四分律行事钞批》等材料，勾稽出唐代的一些三国故事。它创造了古典文学研究界极少利用的从佛藏中寻觅稀见资料的范例，从而使我们看到周先生博览群书，家学渊源有自，并受到业师陈援庵先生倡导使用佛藏材料治史的影响。《〈传奇〉笺证》一文，则是周先生研究唐代传奇的代表性论文。他考证出“传奇”名称之由来和元稹这篇莺莺故事的原来题目，以引据浩博、论断准确谨严著称。

再有一篇是《关索考》，这是周先生在四十年代末期所写的论文，其中考释出的关索的事迹，经过与1975年在上海出土的说唱故事《花关索传》对证，可以说是完全一致。这篇力作曾获得国外学者的一片惊叹。八十年代初，有一位美国学者来华时，专为此文，请北大中文系介绍与周先生见面。

在小说研究领域，还必须提到周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这项研究，周先生坚持了四十余年，发轫于抗战时期，而结硕果于解放后。也是以搜辑丰富资料打好基础，以独特研究成果著称行世，代表性著作是：《红楼梦书录》、《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红楼梦研究论文集》。尤其是前面的两本书，为治红学者提供了不少资料，成为研究《红楼梦》的必备之书。

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首次出版的《红楼梦》校点本，就是周先生和周汝昌、李易两先生合作标点整理校订的。

第三，周先生藏书丰富，文物收藏较多，喜好收集古书和碑帖拓片。他收藏的民间宗教的宝卷，中多不经见之珍品。他收藏的大明历书，目前可以说是国内外诸藏家中最多的。每得一本，他总爱写一些小题跋，现已聚集不少。笔者常劝先生汇集出版，先生过于谦挹，尚不之许。先生又收藏有各类版本的各种章回小说，册数逾万，已捐与天津市图书馆，并曾为之编一简目。收集

的唐代墓志拓片达四千余通，其它各种碑帖拓片称是。所写有关碑刻、书法的论文，重要的如《从老庄思想论〈兰亭序〉之真伪》一文，^①提出晋代老庄之争这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从而证明王羲之的思想是崇老反庄的，因而证明了《兰亭序》为王作是不容怀疑的，这是历来讲哲学史和书法史的人没有提到过的。

在这方面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周先生的两项研究成果：

一项是周先生所作《清代名墨丛谈》，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为建国以来唯一单行的此类著作，填补了斯学空白。此书行文流畅，寓考证于文艺小品之中，犹其余事。

另一项是周先生把自己收集的唐代墓志拓片完全公之于世，再经过旁搜博访，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组织下，正在编纂《唐代墓志汇编》。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开创性工作，预计不久即将出版铅印录文本。有关的副产品，如研究论文等，学术界正拭目以待。

第四，周先生为了研究历史和文学，曾经积累了许多资料，有很多创见，有若干著作。例如：由于注重沟通历史和文学，他积数十年的功力编著了《〈唐才子传〉笺证》，预料问世后将对唐代文学研究提供更大方便。再如《〈旧唐书·地理志〉考订》《〈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考订》都是周先生尚未发表的对唐史研究的重要论文。

此外，周先生为研究文学史，曾花了不小功夫收集历代文论。后来与人合编的《近代文论选》，就是成果的一部分。

以上的工作，一般人只要作到其中的一两点就足以成家，而在周先生，不过是其学术领域中的个别属地罢了。

最后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周先生秉承家学，于佛教典籍特有研究。自从继承叔迦老先生衣钵，正式参加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以来，重点抓房山石经的印刷工作。

房山石经由隋代静琬大师创刻，历唐、辽、金、元、明各

代，延续一千余年，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佛教经籍。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将房山石经作为随喜纪念释迦牟尼佛诞生二千五百周年的一项佛教活动而进行发掘、拓印。至1958年共成七份拓片，分藏于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和其他有关单位。后来经过二十年整理、编目、研究，发现房山石经的辽、金刻经是以失传已久的《契丹藏》为底本的复刻本。复与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内发现的《契丹藏》残卷相对照，发现每版行数、每行字数以及个别用字完全相同，这就以实物有力证明房山石经是《契丹藏》复刻本的事实。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鉴于房山石经是校勘木雕藏经脱误字句的最好版本，中国佛教协会已将房山石经中的辽金部分先行编辑影印出版，供国内外佛教学术界研究参阅。这部分计划编成23册，三五年内出齐。全部《房山石经》预计印成56册。这项工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周先生以当时担任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的身份作为重点来抓的，赶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出版了《房山石经》（辽金部分）第一册，这是当代国际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班禅大师在《房山石经》刊行汇报会上致词说：“房山石经是我国古代的重要佛教文物，是广大佛教徒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的编印出版，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周先生为此项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配合《房山石经》的出版，中国佛教协会还发行了《房山石经之研究》，其中有周先生所作《房山石经与〈契丹藏〉》一文。此文论房山石经与《契丹藏》之关系，考订出辽金刻经是用《契丹藏》为底本，这对房山石经和久已失传的《契丹藏》的研究都是一个新发现。

周先生治学成绩的荦荦大者，大略介绍如上。

先生学界耆宿，诸方倚畀，且体质康强，不吝奖掖后进，故学术活动、社会活动极为繁重。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兼语言文学分会会长，《敦煌古文献》常务编委并负责主编佛经与俗文学部分，中国唐史学会理事，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红楼梦研究集刊》常务编委，《红楼梦学刊》编委，《艺文志》常务编委等。虽事务丛脞，头绪纷繁，而先生日常仍然手不停披，笔不停挥，以期为我国的学术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

《正字通》著作者应为廖文英

《正字通》是一部字书，著者为谁？吴六如《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文字学类”中说是明人张自烈编，又加括号“一说清人廖文英编”。

《四库提要》经部·小学类存目（378页）云：“正字通十二卷。旧本或题明张自烈撰，或题自烈、文英同撰，考钮琇觚觿粤觴下篇，载此书本自烈作，文英以金购得之，因掩为己有……。”近日我读《豫章丛书》中张自烈所撰的《邑山文集》，发现卷十五中《赠廖季子（廖文英之子）序》云：

“会昆湖公（廖文英号昆湖）《正字通》成，客有感叔玉者，谓书诚淹博，若知希何？叔玉默弗答，退谗所亲，曰：‘家先生之为是书，虽以《正字通》名，要其归，明体适用之学……。’”张自烈不仅明白告知廖文英作《正字通》，且引了廖文英之子的话，更可证实。

张自烈，号芭山（芭山在宜春，张取以为号），宜春人（《四库提要》记为南昌人，实误），明季诸生。甲申事起，避居浔阳。廖文英，广西人，崇祯十二年任南康府司理，有可能两人在这时相识。又查《豫章丛书》中张自烈著书自录，知其以治史见长，仅有《字汇辨》是论文字的，字不满千，大概研究文字非其所长，何能作《正字通》。《四库提要》据丛谈杂史，以为是张自烈作而廖文英购之，改署己名，实误。

• 胡迎建 •